

# 美国动态

(半月刊)

2021年7月16日 (第241期)  
仅供参考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美学者：“双重威慑”是美中战略稳定的关键**

加强美国的“双重威慑”政策，辅以权威的保证，是重塑对美中战略稳定信心的第一步。

## 中美关系

### 美学者称拜登政府应在贸易问题上更有效地对抗中国

美媒《国会山报》(The Hill)网站7月5日登载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教授肯尼斯·赖纳特(Kenneth A. Reinert)的文章称,特朗普政府将美国的注意力转向了中国的贸易政策,但它试图解决贸易问题的努力收效甚微。拜登政府必须在贸易上更有效地对抗中国。

文章称,在目前的世贸组织(WTO)的框架内解决一些中国的贸易问题仍有很大空间。譬如,美国已经在世贸组织对中国提起了一些争端案件并获胜。此外,每次中国在争端解决过程中失败后,都能改变其做法。为此,拜登政府需要重新致力于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特朗普政府的目标是破坏它,但这对美国不利。重新启动争端解决机制是在贸易上对抗中国的第一步。美国还需要重新审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议定书,并尽可能利用它们。

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是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不幸的是,世贸组织在国有企业问题上的措辞并不足以解决这一问题。有学者提议,世贸组织需要对有关国有企业作用的条款进行立法修订。引入此类修正案的过程很复杂,但应尽快开始。在此过程中达成共识对于在国有企业问题上获得成功至关重要。

美国还应重启与欧盟和日本的三边委员会,以制定对中国的有效对策。这将为解决中国贸易问题提供更协调、更有力的途径。

### 美军官鼓吹用社交媒体策略应对中国在南海的行动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CFR)网站7月1日登载美国海军军官

罗伯特·弗朗西斯（Robert Francis）等的文章《打赢在南海的公共外交战》鼓吹，东南亚国家应利用社交媒体策略应对中国在南海的行动。

文章称，在南海，北京正利用所谓的“武装渔船队”——“海上民兵”（PAFMM）——作为“灰色地带”的行动者，来宣示北京对争议领土的主权。“海上民兵”通过“阻止”东南亚渔民进入某些渔场，并为中国庞大的渔船队保留使用权，强化了北京的主张。

管辖权、法律和外交问题限制了美国海军和海岸警卫队对中国上述策略的反应；而东南亚国家大多没有足够的海上力量来对付这些策略。

文章称，应对中国在南海使用“准平民”队伍的更好方式是，让北京为这种战术付出高昂的“公共外交”代价。这需要一种策略，将受“海上民兵”影响的渔民的意见集中起来，表明这些“海上民兵”队伍实际上是执行中国主张的“军事工具”。

文章认为，菲律宾、越南等地区国家的政府，或许在日本和美国等地区领导者的财政支持下，可以开展更协调的社交媒体活动，帮助渔民表达他们在南海受到的“骚扰”，然后在地区和全球社交媒体上发布来自南海的视频、图片和故事。

这项工作所需的具体资源将包括音频/视频设备，如装有适合海上渔民使用的应用程序的手机或可上网设备，为用户准备的社交媒体制作、编辑和发布高质量视频的培训课程以及可靠的互联网接入，使海上船只能够现场直播互动。

## 兰德公司分析影响力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作用

美智库兰德公司网站近日登载该智库高级政治科学家迈克

尔·马扎尔 (Michael J. Mazarr) 等合著的报告称, 在中美战略竞争中, 中国的战略之一是在世界各国寻求“影响力”。报告旨在为评估双边影响关系提供一个分析框架和其他工具。

报告称, 中国蓬勃发展的经济实力是其影响力的基础, 北京以符合其利益的方式“操纵”当地政治、经济和社会事件的能力是其寻求影响力努力的一个重要因素。

报告主要发现有: 1. 中国经济的吸引力是其最有效的影响力来源; 2. 资源的投入 (如贸易、外国直接投资、高官访问次数等) 不一定是潜在影响力的最佳指标, 仅在定义影响力挑战的范围和严重性方面发挥作用; 3. 中国对目标国家的特定领导人、精英和舆论塑造者进行的有针对性的、有时伴随着经济激励的接触是仅次于经济吸引力的第二大有效影响力来源; 4. 影响力竞争主要是非军事性质的; 5. 中国在行使影响力方面面临两难境地: 中国越是试图利用其影响力“强行”在其他国家实现国家利益, 这些国家就越是拒绝接受其影响力; 6. 对日益增长的中国实力最普遍的地缘政治反应是对冲, 尽管存在这种主要的对冲趋势, 但该研究评估的 20 个国家的总体地缘政治站位对美国仍然非常有利; 7. 新兴的影响力竞争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政府对政府的竞争。

报告主要提出了五条建议: 1. 对于中国影响的目标, 美国应在它们反抗中国“胁迫”时继续向其提供可信的援助承诺; 2. 美国政府需要一种综合的方法来理解、跟踪和应对中国针对特定领导人或精英的“影响计划”; 3. 如果美国不愿意简单地接受中国经济增长的绝对影响, 它必须做更多工作来开发能够为各国提供替代中国资金的投资工具, 尤其是在基础设施方面; 4. 美国应该支持专注于探讨中国在关键国家活动的独立研究、新闻和透明度倡议; 5. 美国应制定具有更广泛网络的影响战略, 以在目标国家凝聚非政府的意见和行动来源。

## 麦艾文：美国应关注中国的行为而非领导层

《外交事务》(FA) 杂志网站 7 月 8 日登载乔治城大学外交学院亚洲研究主席、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麦艾文 (Evan S. Medeiros) 等的文章《政权更迭在中国不是一种选择: 关注北京的行为, 而非领导层》称, 华盛顿应专注于“改变”中国的行为, 而不是中国共产党。文章摘要如下:

中美关系是当今全球政治的重头戏。它表达并阐明了当下的时代: 大国对抗、意识形态竞争、先进技术的扩散以及美国霸权的削弱。虽然意识形态竞争可能不可避免, 但针对中共不仅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战略, 而且是一种危险的战略。任何试图改变中国政权的尝试都可能失败, 并给美国塑造中国行为的努力带来长期代价。

华盛顿应该集中精力对抗中国政权的“威胁性”行为, 而不是发起一场针对中共的斗争。这意味着要优先创造一个能够共同平衡、约束、阻止和塑造中国选择的国际环境。这种战略要求培养不受北京压力影响、有时愿意反抗中国“胁迫”的国家。这包括在技术转让等重要问题上结成联盟, 深化友好国家间的贸易一体化, 并确保澳大利亚和日本等盟友既愿意也有能力对抗中国在印太地区可能采取的军事行动。它还可能需要阐明可接受的国际行为的明确规范, 通过多边机构使其合法化, 并在必要时通过美国的军事力量来强制执行。

避免过分关注中国政权的最重要的原因是, 这种执迷威胁到美国的核心优势。华盛顿拥有广泛的合作伙伴和盟友网络。建立和维持“制约”中国行动的国际联盟, 对改变中国行为的任何尝试都至关重要。而华盛顿面临的严峻现实是, 大多数美国盟友和伙伴对北京的政权更迭不感兴趣。相反, 大多数人希望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多元化, 他们能从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中获利。他们

希望限制中国政府在国外的强硬行为，但他们并不希望在国内破坏中国政府。

因此，以政权更迭为中心的美国战略将面临严重的问题，无法让合作伙伴加入进来，并有可能损害华盛顿在亚洲和世界范围内保持权力平衡的更大努力。

### 美学者：“双重威慑”是美中战略稳定的关键

加强美国的“双重威慑”政策，辅以权威的保证，是重塑对美中战略稳定信心的第一步。

美国智库史汀生中心网站7月6日登载前美国国务院官员大卫·基根（David J. Keegan）的文章称，美国应该更新和加强其“双重威慑”战略，悄悄增强军事力量，在各个方面积极改善台湾地区的安全，同时向北京保证美国将尊重自1971年以来对中国的承诺。

文章称，战略稳定是指美中都可以在不破坏（甚至可能增强）地区和全球稳定的情况下追求他们界定的关键国家利益。台湾是中国大陆如何定义其与华盛顿关系的核心。如果要实现战略稳定，就必须从这里开始。

政策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可以利用三种方式来调整对台湾和大陆的政策以应对挑战：一是更明确地支持台湾对抗大陆；二是宣称台湾的防务是其自身的责任，美国不再愿意为台湾承担战争的风险，也不再愿意为与其在中国更广泛的议程中付出代价；三是坚持美国当前对台湾和大陆的政策，该政策有时被称为“战略模糊”，现在更多被称为“双重威慑”。如果大陆“威胁”台湾，美国将准备干预，尽管具体的干预方式不明确；但如果台湾宣布

独立，导致中国采取军事行动，美国将不准备干预。

作者认为，第三种选择本质上比前两种选择或美国尚未考虑的其他选择更可取，因为它维持了中美在台湾海峡地区 40 多年的和平。继续这一政策将向中国发出信号，即任何“胁迫性”措施都可能面临不确定但严重的美国反击的风险。该策略建立在演变了 40 年的美国政策的基础之上，更易于中国评估，因此更有可能使中国以美国预期的方式受到威慑。这种做法还有助于阻止台湾未来的政治领导人采取单边行动争取法律上的“独立”，这可能会招致中国的强制回应。

然而，要想取得成功，美国必须通过四项其他措施来加强“双重威慑”战略：

第一，美国必须加强自身的军事准备，以干预中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行动。这意味着可以对抗最新的中国军事技术进步的平台和武器。它还意味着开展训练、部署、军事理论和演习，以充分利用美国在武器和平台方面的优势。

第二，美国需要加强对台湾地区安全各方面的支持，包括台湾“加入”国际组织，特别是世卫组织和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第三，采取上述步骤时必须与台湾及美国的伙伴和盟友协调。只有与台湾地区领导人和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一起“支持”台湾，才能推进战略稳定。

第四，这种威慑必须在与台湾方面进行协调的情况下，辅以美国高层向大陆作出的保证，即美国将继续遵守一个中国政策。实现这种平衡并不容易，大陆也不容易接受，但这对保护台湾地区的现状至关重要。

这种“双重威慑+4”的战略是最有可能有效遏制大陆对台湾采取可能破坏战略稳定的行动的方法。加强美国的“双重威慑”政策，辅以权威的保证，是重塑对美中战略稳定信心的第一步。

# 美国外交

## “捉迷藏”：安全竞争带来的挑战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网站 7 月 6 日载文称，在日益扩大的地理区域以及网络领域中，不断增长的安全竞争将加剧“捉迷藏”的挑战。

文章称，未来 10 年，安全竞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将是“捉迷藏”的挑战，特别是在东欧和东亚之外确定对手国家位置和活动的斗争。不断扩大的全球竞争，中国和俄罗斯拒止和“欺骗”能力提高，以及美国在中东、非洲、南亚和其他地区军事足迹减少，将要求美国及其合作伙伴改善空中、太空以及其他监控能力来监控全球敌对行动。具体包括以下三点：

首先，考虑到美国地面和海洋足迹减少，开发和利用空基和天基能力的需求可能会越来越大，这些能力可以快速收集和处理有关对手活动的大量信息。ISR（情报、监视和侦查）系统和平台应该被设计成可以在高空和低空执行远程和长航时任务，并需要提供超视距探测、识别和定位雷达和通信信号的能力。

其次，可能需要将重点放在越来越多相对廉价的远程打击和 ISR 平台上，这些平台可以在反介入/区域拒止环境中工作更长时间。例如，中国和俄罗斯能力的提高将使两国通过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远程火力和第五代飞机扩大杀伤区域。此外，中国、俄罗斯和伊朗可以向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提供越来越先进的能力，或者它们可以向外国部署地对空导弹系统。

第三，每个层面的竞争都需要一个可以插入传感器、效应器和决策器的数字主干。这一过程可能包括将来自所有军队的传感器连接到一个更有效的网络中。

## 欧汉龙建言美国如何在撤军后帮助阿富汗

美媒《今日美国》网站7月5日登载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主任欧汉龙（Michael E. O' Hanlon）的文章称，随着美国和北约最后一批作战部队将全部撤离阿富汗，美国应协助阿富汗制定一项可行的战略以阻止塔利班快速占领全国。

文章称，新战略应主要由阿富汗制定，但除了美国和北约等其它国家继续提供财政与技术支持外，还应包括以下要素：

一是采取新措施支持阿富汗境内或阿富汗附近数千名西方承包商，使其维护好阿富汗的直升机及固定翼机。这不仅对于在战场上迅速调动阿富汗数量不多但精良的特种部队来说至关重要，还有助于在地面部队遭受塔利班联合进攻时提供援助。二是应将阿富汗南部和东部的一些偏远地区，尤其是大部分对塔利班友好的普什图族部落一带，让与敌军。三是一旦北约地面部队撤离，阿富汗地面部队受到联合进攻时，北约在该地区的空军基地可以用于协助阿富汗新建的空军进行支援。四是若塔利班领导人下令将阿富汗军队作为攻击目标，应对塔利班控制的某些地区发起反攻。五是应在阿富汗众多民兵组织中挑选较为合适的组织，由政府发放薪酬，将其整合入一项整体的行动计划中。六是要制定详尽战略以保护阿富汗首都内一些重要地区，即使可能无法守住整个首都。七是为阿富汗国内流离失所的人建立大型难民营。

## 美专家建议拜登在对非贸易问题上瞄准重点行业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网站7月10日载文称，在与非洲的贸易问题上，若拜登能关注重点行业，就能避免重蹈特朗普政府的覆辙。文章摘要如下：

美国总统拜登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政策的看法是正确的。

但不幸的是，拜登政府有可能在与该地区的贸易和投资问题上犯和特朗普政府同样的错。和特朗普一样，拜登政府似乎也反对“繁荣非洲”计划以行业为重点。该计划旨在显著增加美国和非洲国家之间的双向贸易与投资。

特朗普政府的核心问题是“繁荣非洲”计划缺乏对行业的关注。为了真正开启与非洲的贸易和投资，美国的商业政策应该瞄准特定行业。然后，拜登政府可以展示最具吸引力的机会以及非洲市场的重要性。如果以行业为重点，“繁荣非洲”计划就可以通过特定行业激发潜在的投资热情。“电力非洲”计划正是如此，该倡议现在有超过 100 个私营部门合作伙伴。

为了实现大幅度增加双向贸易和投资的目标，拜登政府必须确定重点行业，以吸引美国企业和非洲伙伴。最有前途的行业包括金融服务、农业经济、可再生能源、科技、医疗保健和娱乐业。

然而，明确对特定行业的承诺并不意味着对其他有兴趣在非洲市场非重点领域开展业务的美国公司关上大门。相反，“繁荣非洲”的内部协调机制对所有寻求通过美国大使馆的交易团队获得支持的公司仍然有效。

一个有效的“繁荣非洲”计划将保留前所未有和强大的后端协调，但它将确保由优先产业部门组织对外沟通和与公司的联系，以激发更大的兴趣，并吸引新公司在该地区投资和贸易。

### 美智库建言美日韩三方合作应对中国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近日发布报告称，美中关系将成为决定 21 世纪国际秩序的最重要的关系之一。中国构成的“挑战”的性质、亚太地区国家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以及美国领导地位遭受的严重质疑，都要求美国从根本上重新评估美日韩的三边合

作。该报告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摘要如下：

第一，美日韩加强经济协调，改革世贸组织。

美日韩在经济层面进行更紧密的协调。三国应探讨建立一个更正式的协调机构，以便制定应对外部经济影响的措施，这些措施可以包括临时降低关税、有针对性地购买受影响的物资等。

在改革世界贸易组织方面，拜登政府应首先改变美国阻挠任命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新法官的做法。美日韩应努力建立一个改革世贸组织的国家联盟，以确保世贸组织按预期运作。

第二，在某些议题上合作，保持联盟的灵活性。

美国单方面要求日本和韩国遵守美国对华政策的做法将破坏合作，损害联盟，导致亚太地区的分裂和冲突。美国需要更好地理解日本和韩国的立场，并将这些立场纳入自己的决策过程。日韩各自的经济和安全利益意味着他们对待中国的方式将不同于美国。

为不以中国为中心的合作创造机会：建立一个公开以中国为重点的联盟，将进一步强化美国及其盟友的目标是摧毁中国的说法，这最终会适得其反，而不是加强合作。美日韩可以在与中国无关的其他领域进行合作，比如卫生、教育、发展和疫情防控等。三国在东南亚的目标和优先事项上也有很大的重叠，这将使它们能够共同努力，推进不对中国构成威胁的共同目标。

认识到韩国和日本之间固有的紧张关系：东京和首尔并非天生的伙伴。两国在历史上的不信任导致政治合作变得困难。然而，大多数韩国人（59%）和日本人（80%）都认为中国是竞争对手，而不是合作伙伴。两国民众支持在东南亚的开发项目上合作，也支持两国分享有关朝鲜核计划和导弹计划的情报。

第三，与中国竞争，与东南亚盟友进行协调。

在东南亚，美国对该地区的军事关注没有转变为相应的外交

和财政努力。美国及其盟友应该在关注海上航道的同时，重新关注那些有利于东盟地区的政府、人民和企业的问题。

在服务和大型基础设施领域竞争。建设大型基础设施可能有助于将商品和人员从一个地方运送到另一个地方，但这些基础设施周围的社区不一定能受益。要让这些社区受益，就需要提供互联网连接、教育、医疗和法律服务等。美日韩应利用它们在服务领域的共同竞争优势，围绕新建设的基础设施开展工作，投资于整个地区的城市和社区，创造机遇。

把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DFC）和亚洲开发银行当作组织支。DFC 为美国部署其发展预算和与其他国家进行协调提供了一种新方式。DFC 应该与日本和韩国的相关组织合作，在东盟各国投资于发展项目、可持续性和气候倡议、中小企业和女性所有企业。美日韩在东南亚地区已经很活跃，但它们的活动没有很好地协调。这些活动应与亚洲开发银行的活动及其 2030 战略密切协调，以扩大在该地区的投资范围，帮助减轻气候变化、水危机和卫生条件差的影响。

## 美国政治/其他

### 美学者提出“新十四点”原则

《国会山报》网站近日登载得克萨斯农工大学美国外交关系教授伊丽莎白·科布斯（Elizabeth Cobbs）等的文章称，美国总统威尔逊在 1918 年提出了“十四点”原则，以为各国建立一个“安全的世界”。但是，该安全范式已经不符合当前的时代需求。作者提出了“新十四点”原则：

1. 单边主义已过时。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应该放弃

自 1945 年以来拥有的否决权。2. 在它国领土上的外国军事基地应该由多国联合部署或撤除；消除核武器。3. 海洋、大气层和太空应该非军事化，用于商业和科学。任何国家都不应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在上述区域巡逻或发动无人机空袭。4. 除非有联合国安理会的命令，且在极度特殊的情况下，否则绝不能对外国内政问题采取军事干预。5. 应拒绝向任一国家国内武装冲突的各方进行国际军售。6. 成年人自愿进行的非暴力活动，如使用麻醉品，应该合法化，以剥夺国际犯罪团伙的收入。7. 联合国 2015 年通过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应在所有成员国政府的国内会议中加以讨论。8. 应鼓励可持续的农业和工业实践。不可持续的农业和工业做法应该受到惩罚。9. 保护森林完整从而维护地球“肺”功能的国家应该得到补偿。10. 随着海平面上升，联合国应该制定计划，重新安置流离失所的人们。11. 建立一个国际法庭揭露和打击腐败官员。12. 公司应遵守国际透明度标准；离岸避税天堂应该被废除；国家和国际机构应禁止网络空间中的匿名行为。13. 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进行国际监控，以确保其符合道德和法律标准。14. 为阻止全球虚假信息活动，营利性社交媒体公司应遵守和其他媒体相同的诽谤标准。

### 美学者：美国的军国主义神话是糟糕的分析

美国《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 杂志网站近期登载美国企业研究所(AEI)高级研究员哈尔·布兰兹(Hal Brands)的文章称，美国的军国主义(militarism)神话是一种糟糕的分析，应打破这一神话。文章摘要如下：

美国沉迷于战争，或者说，这是后冷战时代两党对美国治国方略日益强烈的控诉。学术界和华盛顿的左翼和右翼批评者认

为，政策制定者本能地诉诸武力来解决国际问题，而这些问题或许可以通过非军事手段更好地解决，或者干脆不采取任何行动。美国需要就如何、在何处以及是否在一个资源紧张的时代使用军事力量展开一场严肃的讨论。

然而，布兰兹认为，美国的军国主义神话是导致糟糕处方的糟糕分析，因为它夸大了美国使用军事力量的意愿、在冷战后军事冲突中的失败率以及美国经历的国内反弹。是时候认真思考军事力量在一个难以控制的世界中的作用了，这意味着要抛弃目前扭曲公众讨论的错误观念和陈词滥调。

如果军国主义是问题所在，那么建立并更多地依赖非军事手段必然是答案。这种观点至少有一半是正确的。与过去 20 年相比，非军事手段将在美国未来 20 年的治国方略中发挥更大作用。在塑造中美对抗方面，技术、意识形态和经济竞争将与军事威慑同等重要，这意味着美国的官僚能力自然会被重新评估。

然而，美国能够谨慎地实现再平衡的程度是有限的。无论是对付恐怖主义还是在其他领域，军事力量都是不可或缺的。只有维持军事威慑，外交和经济治国方略才会处于中美关系的前沿。在一系列问题上，从阻止俄罗斯在波罗的海的侵略到回应伊朗在波斯湾的挑衅，非军事手段的作用是有限的，军事力量仍然是最后的手段。

布兰兹认为，美国的军国主义神话在分析上枯燥无味，在战略上也具有破坏性。因为如果美国只是单纯地沉溺于战争，那么显而易见的处方就是彻底戒掉。然而，在现实中，使用军事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谨慎的战略范畴，因此，呼吁结束无休止的战争可能会淹没有关如何、在何处部署美军的冷静的政策讨论。

关键的辩论应涉及以下问题：华盛顿在限制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参与时，愿意接受多少重新发生恐怖袭击的风险；它仍然愿

意使用多少武力来将这种风险保持在一个可接受的水平。这场辩论需要智力上的微妙权衡与老练的思考。

## 学者称美海军迫切需要改革

美国“War on the Rocks”期刊网站6月30日登载新美国安全中心（CNAS）国防项目高级研究员克里斯托弗·多尔蒂（Christopher Dougherty）的文章称，美国海军濒临“战略破产”，迫切需要改革。

文章称，美国的海军战略处于“战略破产”的边缘，对中国构成的“风险”缺乏共识、对未来的舰队缺乏共同愿景，以及实施新愿景的选择有限，是美国海军改革的障碍。在当前战略环境的背景下，这些缺口尤为突出。

一是缺少共识。尽管美国防务界大多数人都认为中国是国防部的“主要挑战”，但对于中国构成何种威胁、冲突风险在何时最为严重的共识更少。

二是缺乏一个共同愿景。任何一位战略家对如何打造一支海军的看法都取决于他如何评估中国构成的“挑战”，以及风险在不同时期的分布状况。一些人关注近期的日常竞争，他们倾向于首先打造一支庞大的、随时可出动的舰队来保持在南海等关键海域的海军力量。一些人关注未来5-10年内发生常规战争的风险，他们愿意牺牲一些近期的战备和能力来打造一支能够赢得未来与中国冲突的军队。使情况更复杂的是，国防社区内不同群体的风险评估和战略愿景往往不同。这些不同群体的愿景之间的竞争每年都在项目审查和预算请求中上演，竞争的结果往往是一个不令人满意的妥协，并无法清晰地描绘出未来海军的愿景。

三是缺少选择。美国海军2022财年预算请求强调先进弹药

和研发，并削减遗留的水面战斗舰队，这说明拜登政府将追求中期和长期的综合方法。这些拟议的削减船只，以及预算中缺乏的置换选项，是海军打造一支拥有 300 多艘舰艇的舰队的又一障碍。国防预算难以在短期内提供可靠的选择来使舰队进行资产重组。几十年来，一系列的决策和犹豫不决使海军陷入预算和军队规划的困境。这是海军战略的核心问题。为了使海军从其军力规划的低迷状态走出来，下一份《国防战略报告》应该明确对中国挑战的评估，并作为一种强制力量来勾勒未来海军的共同愿景。

对中国挑战的清晰评估，加之对未来舰队的共同愿景将有助于弥补战略和实施之间的差距。或者更重要的是，它或许将使海军和国防部领导与国会合作开展一项长期项目，以重建海军并重振海军和美国依赖的海洋工业基础。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并不容易，然而，如果没有这种共识和共同努力来扭转几十年来的困境，美国海军将继续逐渐走向“战略破产”。

### 美学者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的利与弊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网站近日登载该中心国际安全项目情报研究员杰克·哈林顿（Jake Harrington）的文章称，《创新与竞争法案》奠定了美国与中国竞争的正确基调，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文章摘要如下：

《创新与竞争法案》将批准对一系列新兴技术投资 2500 亿美元，这是受欢迎的做法，但美国不能也不应试图在政府支持的投资竞赛中与中国竞争。该法案的价值不在于获取的投资数额，而在于一系列旨在保护美国创新和增强国家竞争力的反情报和增强安全的措施。

文章称，该法案希望增强美国创新的推动力，即学术研究、

政府资助、风险投资和自由市场竞争的互联性，来与中国的军民融合国家战略竞争。但是，即便美国的做法会在长期内处于优势，若没有“公平”的竞争环境，它成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

为此，该法案中的安全条款打算以各种方式扩大有关经济和研究安全的努力。法案将限制与某些外国人才项目有联系的学者参与美国政府资助的研究。然而，这挑起了国家安全界和学术界的紧张关系。政府和研究界之间密切、富有成效和相互信任的关系对于有效的安全战略不可或缺，因此，保护美国研究的完整性和战略优势必须与对学术自由的合理期望相平衡。

《创新与竞争法案》指示科学技术政策办公室主任建立一个研究安全和诚信信息共享分析组织(RSI-ISA0)为美国研究界成员提供获取信息的途径，以了解和识别外国实体为获取研究、技术、材料和知识产权所采取的行动。但法案将资助 RSI-ISA0 的义务归于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目标是在不久后过渡到收费模式。这种模式会损害该组织的整体效力，也反映了法案背后的问题：缺乏资金。尽管法案初衷良好，但若没有适当的资源投入，RSI-ISA0 等机构的努力将收效甚微。

此外，国会在该法案中还强调网络安全是研究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法案要求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制定标准，并与研究机构分享最佳实践。然而，改善整个高等教育的网络防御需要的是资金，而不是制定额外甚至是多余的风险管理标准。资金的缺乏暴露了反间谍和安全领域的一个长期问题：资金投入与承诺不相符。

《创新与竞争法案》强调加强对美国研究和创新面临的一系列威胁的认识是值得称赞的。但要采取创新的行动，就研究人员面临的敌对行为体的威胁与学术界进行积极、有意义的接触，需要新的思维、人力和充裕的预算。研究安全面临的威胁是

真实存在的，它们需要持续的伙伴关系、相互理解以及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协作。

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编辑部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编辑部：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邮编：200020

电话：021-33665148

工作邮箱：[bianjibu@sias.org.cn](mailto:bianjibu@sias.org.cn)